

《论语》杂志的政治批评与公共领域之建构

俞王毛*

【摘要】《论语》杂志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平社和《语丝》，该刊承载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具有明显的政治维度。《论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政治上的中间立场，将政治批评和幽默话语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批评空间。同时，它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公共论坛在汇聚意见、形成舆论上的优势，鼓动公众对各种政治问题展开讨论。《论语》在政治批评上的诸种努力，促进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共领域的建构。

【关键词】《论语》杂志；政治批评；公共舆论；公共领域

《论语》杂志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文学期刊。它不仅倡导幽默闲适文风，也致力于思想文化建设，在政治批评方面用力尤勤，对于推进公共领域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论语》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被长期遮蔽。今天，有必要重新考量《论语》在政治批评上的独特贡献，以便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涉及公共性原则，“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①。哈氏的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了视野。李欧梵曾运用它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他认为，自晚清至1920年代，知识分子借报刊开创了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没有留下多少自由言论的余地，知识界也不再将语言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是将之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工具，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和公共空间的萎缩^②。李欧梵的分析很精彩，不过其结论有偏颇之处。事实上，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治文化对文学的普遍性影响，知识分子的议政热情被极大激发，公众舆论仍然十分活跃。左翼作家以大胆激烈的政治批评对权力主体构成“威慑力量”，^③成为时代主潮。与此同时，新月派、论语派、独立评论社等知识分子群体也持续地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众多声音形成一股合力，三四十年代的公共领域由此建构起来。在这些声音当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人文与艺术系讲师，330013。

①[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126页。

②[美]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22页。

③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中,《论语》杂志的政治批评无疑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存在。

一、《语丝》、平社与《论语》的政治维度

《论语》杂志曾因宣称不谈政治而为人诟病。其实,《论语》的政治热情不亚于其文学兴趣。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中,文学与政治有着纠结难解的关系,“三十年代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明显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带有明显的‘亚政治文化’特征”^①,《论语》杂志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厚的政治文化色彩,具有明显的政治维度。《论语》一方面重视文学的自主创作,大力提倡幽默小品文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也将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贯彻始终,从初创到终刊,除某些专号外,每期都会拿出大量版面来登载社会新闻并表达意见。它的不少栏目是以刊登时政内容为主的,如“论语”、“半月要闻”、“古香斋”、“各地通信”、“雨花”等,其中“论语”栏主要发表时评,“半月要闻”、“古香斋”、“各地通信”、“雨花”等栏目主要刊载时事,漫画栏多登政治讽刺性作品。不少幽默小品文的内容也与政治有关。“半月论语治天下,天下不治可奈何?”^②编者的这番感慨,形象地道出了《论语》的政治批评旨趣。

《论语》以政治作为主要表现内容,这种选择既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也基于编者、作者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取向。从《论语》长期撰稿人名单可以看出,它最初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原平社成员,包括林语堂、潘光旦、全增嘏、沈有乾、邵洵美、刘英士、赵元任^③,占了近三分之一;一是原《语丝》作者,包括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俞平伯、刘半农、章川岛、章衣

萍、林幽,占了三分之一强(按,最初列名《论语》长期撰稿人的共有24人,实为23人,因章克标、岂凡为同一人)。由此可知,《论语》杂志与平社和《语丝》都有密切关系。

平社直接促成了《论语》的创刊,并决定了《论语》最初的面貌。平社成立于1929年,是以胡适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成员约20人,大部分属新月派。成员信奉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多有批评。由于保持与权力主体抗争的立场,平社核心人物如胡适、罗隆基等遭当局忌恨,受到人身攻击甚至迫害,平社活动在1931年底无奈终结。不过,留在上海的原平社成员常有联络,他们中爱好文学的几位经常相聚谈文论道,创办《论语》的想法就来自这样的聚谈。《论语》的发起人有林语堂、邵洵美、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郁达夫、林徽音、章克标、张光宇兄弟、潘光旦、叶公超等十来人^④,其中林语堂、邵洵美、全增嘏、沈有乾、潘光旦、叶公超等六人是原平社成员,《论语》创刊后,他们积极为之撰稿,成为《论语》的中坚力量。

《论语》与《语丝》的传承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前人对此多有论述,苏雪林的观点可为代表。她认为,《论语》“是由《语丝》的‘个人主义’‘情趣主义’一个道统传衍下来的,不过更加一个大题目,便是‘幽默’的提倡”^⑤。《论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语丝》的思想资源。《语丝》的时政批评路向、不依附于任何外在力量的独立性、任意而谈、幽默闲适的文体特征,都成为《论语》的借镜。当然,《语丝》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林语堂和其他原《语丝》作者共同实现的。三十年代,周作人、俞平伯、孙伏园、孙福熙、章衣萍等语丝诸子仍然固守《语丝》个人主义的立场,他们大力支持《论语》的创办,并将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社会关怀投射在《论语》上,使

^①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第52页。

^②《论语周年秋兴有感》,《论语》第25期,1933年9月16日。

^③关于平社成员的构成情况,参阅胡适《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沈卫威:《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姜义华:《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

^④章克标:《林语堂在上海》,子通主编:《林语堂评说七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⑤苏雪林:《〈语丝〉与〈论语〉》,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3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3页。

其打上《语丝》的深刻印痕。

将原平社成员和原《语丝》作者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是同属这两个群体的林语堂。作为奠定《论语》基调的第一任主编,林语堂对于《论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林语堂年轻时曾留学欧美,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政治、文化、国民性改造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语丝》时代,他将“必谈政治”作为中国精神复兴的重要条件^①,常常质直激烈地批评时政,表现出“真诚勇猛”的“书生本色”^②。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他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以批评为职志^③。1930年初,林语堂成为平社成员并多次参加活动,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和讨论各种社会问题^④。这种出入于《语丝》和平社的经历对他的文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也必然会在主编的《论语》上反映出来。同时,他凭借着与平社成员和《语丝》作者的交谊,将他们引入《论语》这个新的发言场所,使《论语》得以充分利用《语丝》和平社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本和文学成就。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文学期刊的《论语》热衷于政治批评的原因。布迪厄指出:“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⑤《论语》杂志的独特面貌既与三十年代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有关,又与《论语》对美学和政治的双重追求有关。综合考量《论语》的主编、发起人、长期撰稿人身份和实际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看出,《论语》既承载着林语堂等人的文学理想,又延续了平社和《语丝》的政治热情——平社曾经讨论过的民治制度、自由权利、法制建设、国际关系等“中国问题”在《论语》上被继续关注 and 讨论;《语丝》“自由思

想”、“独立判断”的批评理念^⑥,也为《论语》所继承。《论语》在致力于幽默小品文实验的同时,大量编发政治批评文章,这样的内容安排看似矛盾,其实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语境和论语人的文学追求、政治兴趣共同作用下的必然选择。通过对种种政治问题发言,《论语》积极介入社会事务,参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二、身份、立场与批评的独立性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范畴”^⑦。公共领域是一种观念性存在,它能否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取决于能否形成公共意见,也即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与一般意见相区别的根本点在于其公共性。许纪霖认为,公共性有三个涵义:面向公众发言;为了公众而思考;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⑧。公众舆论的这种规定性,要求批评主体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时秉持公心,保持独立身份与公正立场,以获得批判性反思的力量。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得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一般通过报刊书籍等传媒反映舆情,形成意见中心,进行社会干预。然而,由于身份、立场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能成为公众舆论。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往往以结社、办刊等方式形成舆论群体。这些群体的立场各不相同,部分有官方背景并接受官方资助,如民族主义文学阵营;也有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群体,如独立评论派、再生社等。有官方背景的知识分子群体容易对政权产生依附性,部分地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而自由主义

① 林语堂:《给玄同的书》,《语丝》1925年第23期。

② 郁达夫:《导言》,郁达夫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第16页。

③ 林语堂:《论现代批评的职务》,天水、杨健选编:《林语堂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④ 参阅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

⑤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⑥ 《发刊词》,《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⑦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

⑧ 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者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心理。例如,《独立评论》最初以公论代表的面貌出现,曾被视为中国舆论的中心,后来却对国民党政府表同情,部分成员甚至支持独裁政治,使舆论界大为失望,致有政府的“应声虫”和“留声机”之讥^①。对公共权力的依附必然使言论的公共性大打折扣。《论语》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边缘立场,站在公共权力之外对其进行监督与纠偏。

《论语》的独立身份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中间性选择。三四十年代,集团政治兴起,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还是与之对抗的共产党,都表现出集团主义的强大统摄力,不少知识分子为集团的力量所笼罩,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林语堂等人热心于政治批评,但避免与具体的政治党派发生关联。在他们看来,“卷入政治的文学必然屈从于政党的纪律和政党的政治”^②。他们选择了中间性的“老百姓立场”,并且表示,“论语里面假使间或有几篇有政治意味的文章,那并不是我们对政治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对我们老百姓有切身的关系,同时,我们的兴趣也绝对不是代表某一派别‘意识形态’的兴趣”^③。这种选择,既是为了维护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也是为了守护批评的独立性。在多数情况下,《论语》的政治批评确实是独立不倚、站在民众的立场说话的。《论语》的独立身份还表现在经济的自足上。编者在《创刊缘起》中声明办刊资金与任何政治势力无关,并将“不拿他人的钱”写入《论语社同人戒条》。刊物创办之初,印刷、发行等费用均由邵洵美承担,同人写稿、编辑都是义务性质。不久之后,《论语》开始盈利,就更有了经济上的保障。独立身份的获得和保持使《论语》远离权威思想的规训和影响,真正做到“不

说他人的话”、“只谈老实的私见”^④。

《论语》的边缘立场表现在对公共权力的疏离上。《论语》对实行专制的国民党政府是不信任的,它总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对当权者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审视与评判,揭穿堂皇的官方话语的欺骗性特征和虚弱本质。例如,《赋得迁都》针对南京国民政府迁都、还都之事发表评论,认为政府所举“生聚教训”等迁都理由只是唱高调,迁都之举其实表现了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胆怯心理^⑤。《再启者之又一运用》则从《宪法》加添临时条款一事,看出政府名为修宪、实则欺民之用心^⑥。“一种文化立场或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⑦。边缘立场为《论语》带来批判性反思的力量,使它在面对重大政治问题时能够明辨是非,并敢于将意见公之于众,由此对处于中心的权力持有者造成威慑,实现舆论监督的职能。

刘易斯·科塞在其名著《理念人》中谈论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批评方式,他指出:“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⑧《论语》周围的知识分子正是科塞所说的“理念人”,他们坚守独立身份和边缘立场,与权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从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对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并引导公众参与讨论,使《论语》成为公共意见中心,实现借舆论的力量约束公共权力的目的。必须指出的是,三四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专制和思想统制,不少人面对社会弊端要么不敢开口,要么尽说空话,“整个社

①记者:《舆论的造成与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②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③邵询美:《编辑随笔》,《论语》第143期,1947年12月16日。

④《论语社同人戒条》,《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

⑤语:《赋得迁都》,《论语》第7期,1932年12月16日。

⑥达:《再启者之又一运用》,《论语》第154期,1948年6月1日。

⑦陶东风:《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兼论文学创作中历史与道德的几种关系模式》,《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

⑧[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会充满着诈伪、虚骄、自欺欺人的空气”^①。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下,《论语》在政治批评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显得弥足珍贵。

三、幽默话语与批评的自由度

在专制政治下进行独立的时政批评,“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②,其艰难和危险自不待言。国民党政府对思想文化的压制大大超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和各种出版法规给言论设置了重重障碍。左翼直接对抗政府的书刊固然在禁毁之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议政言论也时遭压制,《新月》就曾因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等文章而被查禁。在此种紧张逼仄的言论氛围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批评的自由,就是知识分子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与官方书报审查制度作了多种形式的抗争,《论语》的幽默小品文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林语堂曾回忆自己是如何“走向‘幽默’一途”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③从以上所引的话可以看出,在官方的新闻审查制度下寻求“发表思想”的自由,是林语堂和《论语》选择幽默的一个重要动机。

《论语》的幽默文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无所为的幽默”^④,以轻松谐趣的笔墨描写生活,品评人物,大华烈士的《西北风》、如愚的《也是斋随笔》都是这类作品,这样的文章洞达人情物

理,又带有超脱世事的情怀,在不经意中闪现智慧之光,使人读后发出“会心的微笑”。另一类是蕴含着批评之力的幽默,也就是林语堂所提到的“讽刺文学”,这类幽默杂糅着讽刺、诙谐、滑稽、冷嘲、反语等成分,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说真话,“用‘寓庄于谐’的方法来对付专制势力,使锐利的语意含蓄得不露锋芒”^⑤。《论语》上更多的是第二类幽默作品,所谓“论语体”^⑥主要由这类文章构成。例如姚颖的《京话》报道金陵女大接收短跑名将孙桂云免试入学的新闻并加以评论,认为党政要人可以向孙桂云学习跑的技巧,以便在事情紧急或荷包充满时及时开溜。文章最后评论道:“跑之功用,不仅意义伟大,而且在今日之南京几为运时良药,金陵女大此举,真可谓功不在禹下。”^⑦全文以反话正说的方式讽刺南京官场吹、拍、贪、跑的恶劣风气,十分辛辣。童锡祜的《卖国救国方策》也是寓怒骂于嬉笑的妙文。文章说,政府既然救国无方,不如将国家卖与外国,等外国把它治理好了再收回来,这样国家就能完全得救^⑧。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救国无能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这类作品风格诙谐而主旨严肃,恰如《论语》第52期封面所引李笠翁之言:“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

林语堂曾在二十年代提倡幽默,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到了三十年代,《论语》式的幽默却大受欢迎,冷与热的背后,透露出文学与时代紧密关联的信息。二十年代,军政当局对言论也有严格的限制,但总体上看,政治批评还是有着较大的自由空间的,林语堂就说过,与国民党统一后的言论环境相比,那时“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因而人们还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⑨。国民党统一中国

①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文周报》第11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

②周作人:《火山之上》,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253页。

③林语堂:《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④《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论语》第6期,1932年12月1日。

⑤钱仁康:《论幽默的效果(下)》,《论语》第46期,1934年8月1日。

⑥吕若涵:《“论语派”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8页。

⑦姚颖:《京话》,《论语》第25期,1933年9月16日。

⑧童锡祜:《卖国救国方策》,《论语》第2期,1932年10月1日。

⑨林语堂:《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后,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思想统制,致使民众的政治意见无法表达。如此一来,“在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青年中普遍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一种政治的郁积。这种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和排解的渠道,而进步书籍尤其是进步文艺作品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渠道的作用”^①。《论语》对幽默的提倡,正是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心理的理解和呼应。《论语》的读者主要是市民大众,在《论语》的启发下,他们找到了幽默这种相对安全的方式释放“政治的郁积”。不仅如此,借着隐喻、反语、类比、微言大义等语言技巧,《论语》的作者和读者还实现了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和嘲讽,在笑声中创造并共享着“同一个观念世界”^②。这个世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存在,抵制并消解官方话语和新闻审查制度。

幽默话语是一种智性话语,只有在看穿了批评对象的虚弱和卑怯、并在道义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因此,幽默不仅是对付审查制度的利器,也能帮助批评主体获得思想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使其“不仅从外部书刊检查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且首先从正宗的内部书刊检查制度中,从数千年来人们所养成的对神圣的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过去、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③,从而得以摆脱权威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保持清明理性和自由人格。与直言指摘时弊的文字相比,《论语》式的幽默文字显得曲折隐微,《论语》也因此招来激进者的不满。然而,与其说这是胆怯者的文字游戏,倒不如说是智者妙不可言的话语创造。借助于幽默话语,《论语》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④,在不自由的时代为自己争得批评的相对自由。

四、作为公共论坛的《论语》

对于公共领域的形成来说,公众的交往和讨论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交往和讨论是通过公共论坛实现的。现代社会中,咖啡馆、沙龙、宴会、学会等都具有公共论坛的性质,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则是其中“最典型的机制”^⑤。中国知识界深谙传媒与公共舆论的关系,《苏报》在1903年即指出,“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⑥;《现代评论》以“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作自我定位^⑦。林语堂和他的继任者们也是将《论语》作为公共论坛来经营的。林语堂表示:“吾集天下健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论语向来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论语早已公之天下矣。”^⑧邵洵美则称:“全部论语何尝不是‘大众的园地’!”^⑨在实际的编辑工作中,他们都注意发挥《论语》的传媒特性,使之成为公共交往的空间和公众舆论的载体。

《论语》上的交往和讨论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广泛地展开。一方面,《论语》以其开放性和吸引力聚集了众多有名无名的作者。《论语》最初是以同人刊物的面貌出现的,其《创刊缘起》就是一篇典型的同人刊物宣言,前几期所刊文章也大多为同人所撰。不过,《论语》无意固守同人的小圈子,第一期即表示“本刊接收外来投稿”,第二期起开始刊登部分外稿,此后《论语》上不断有新人新作出现。这些作者大都属于市民阶层,包括文人、军人、教师、学生、政府官员、公司职员、家庭妇女,等等,他们有着各自的职业和身份,带着各自关心和擅长的话题加

①朱晓进:《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②[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③[苏联]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④[美]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现代性的追求》,第20页。

⑤[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6页,第218页。

⑥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⑦《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⑧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1933年11月1日。

⑨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第143期,1947年12月16日。

入《论语》，又在一些重大话题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促使《论语》成为公共论坛这一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论语》努力争取读者支持并鼓励他们参与到对问题的讨论中来。由于经营得法，《论语》有着可观的发行量，每期销售一万份以上，有时达两万份，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设有代售处，还有数个海外代售点，林语堂所谓“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决非虚言。为了凝聚众多读者的意见和力量，《论语》十分注意与读者进行交流。《论语》设有“群言堂”栏目，该栏以刊登读者来信为主，并常附编者的答复。不少读者来信是针对《论语》文章所发的感想，而编者也在答复中也尽量给予其同情之理解。例如，第2期“群言堂”所登童锡祐《卖国救国方策》是对创刊号上岂凡《五十年兴国计划说明书》一文观点的支持和发挥，编者在回信中称《卖国救国方策》为“一篇沉痛语”，“说许多人不敢说的语（“话”字之误写——引者注）”，表达了对原作和读者观点的积极回应。除了“群言堂”，其他栏目如“古香斋”、“编读往来”也常有这类互动。作者、读者、编者之间的这种认真深入的讨论饱含着思想和感情的巨大能量，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进而形成公共意见。

通过种种举措，《论语》成功地形成了“开放的舆论生成和流通系统”^①，这种系统在面对重大政治问题时尤其显出批评的威力。抗战爆发前，《论语》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有抗日、吏治、外交、民主与法治等问题；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论语》主要关注国共内战、国家前途、民权民生、国际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论语》注意组织相关观点，形成公开讨论的氛围。下面就以该刊第170期对国共内战问题的讨论为例，分析其造成公众舆论的方式。

第170期《论语》出版于1949年2月1日，在这国共内战正酣、国家前途未卜的时刻，《论语》聚焦和战问题，精心组织相关文字和图像，代表公众发出停战的呼声。本期封面是丰子恺所绘漫画《万里征人罢战归》。正文第一栏“半

月要闻”共转载了六条消息，前四条都与和战问题有关。《论语》借此传达了民众对和平的盼望，同时还含蓄地表达了对政府“和平诚意”的怀疑。“论语”栏的《和平种种》一文指出，人民久厌战乱，望和心切，而政府当局顾念自身利益，表面倡导和平，实际上却在拖延观望，致使和平之路荆棘丛生。吕宾的《乱想录·和而不同》认为，必须有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并且消灭导致战争的因素，才能真正实现和平。陈惠龄所绘《连台好戏》、《愿和谈成功》等漫画都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连台好戏》题词为“前台唱作空城计，后台赶扮战长沙”，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真战的意图；《愿和谈成功》感叹“白骨已堆成喜马拉雅山”，和平还不知是梦是真。在“群言堂”中，陈惠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进一步阐释了漫画的主旨。编者也借《编辑随笔》指出，政局难料，不知十多天后会是什么局面，是和平“全部成功”呢，还是政府“戡乱到底”。和战问题是经受了数年内战煎熬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以之为话题确实能够牵动民众的神经。《论语》围绕着和战问题编发的这些文字和漫画反映了典型的社会情绪和多数人的意见，它的传媒特性又使这些情绪和意见迅速地传播开去，激起更大范围的讨论，由此形成影响广泛的公众舆论。

“当一群人针对同一件事情开始发言讨论或是关心同一个现象的发展，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②。作为公共论坛，《论语》充分发挥自身在汇聚意见、形成舆论上的优势，通过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公开讨论，促进了三四十年代公共领域的建构。

结语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的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

^① 阎克文：《译者前言》，[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2页。

^②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

成。这种公共讨论被体制化地保护,并把公共权力的实践作为其批评主题。”^①在由公共意见所构成的公共领域里,“人们可以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而不必受制于政治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②。在中外文明史上,很难找到这种符合理想模式的公共意见和公共领域,因为其存在的前提——彻底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实现过,因而公共领域永远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对于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来说,建构理想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显得尤为艰难。现代中国一直处于专制制度的阴影之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不少国民仍处于半蒙昧状态,因而少有“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保护公共讨论的体制更是付之阙如。面对这样的言论困境,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引导公众舆论,建构了一个与公共权力相抗衡的公共领域。其中,《论语》杂志由于发行量大、存世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它创造性地将幽默话语、理性思维与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结合起来,冲破思想统制和新闻审查所形成

的障碍,利用现代传媒的优势,广泛发动公众参与对社会事务的讨论和批评,为拓展三四十年代的公共领域、推进现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它的政治关怀和批评艺术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曾经断言:“一份期刊就像一个人,生命虽短,但却影响着他所处的时代,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他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其个性与能力。”^③《论语》正是这样一份充满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期刊。它既固守文学自主的疆界以观照美,又冲破重重阻力批评时政以守护善。在长达八年的生命历程中,《论语》一直以独特的文学个性和思想特征影响着它的时代,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作为一份丰富复杂的历史遗存,《论语》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在政治批评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值得我们铭记。

(责任编辑:陆 林)

Lun Yu's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YU Wang-mao

Abstract: A major part of Lun Yu's ideological resources was from Ping She and Yu Si, which carried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political phenomena, featuring an obvious political dimension. Adhering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al middle ground and combining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humorous discourse, the magazine won a lot of freedom to make political criticism. Meanwhile, *Lun Yu* used its own advantages of bringing together the views and forming public opinions as a public forum,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make an open discussion on various political issues. Its efforts to make political criticism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Key words: *Lun Yu*; political criticism; public opinion; public sphere

①[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126页。

②萧瑟:《布尔特曼和哈贝马斯——与大师们同在的岁月(之三)》,《读书》1996年第10期。

③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50页。